

当代史学平议

李振宏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当代史学平议

李振宏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史学平议/李振宏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 - 7 - 5097 - 7635 - 3

I. ①当…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历史 - 古代史 - 文集
IV. ①K220. 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0887 号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宋 超

出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35.25 字数: 540 千字

版次 /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635 - 3

定价 / 12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衡定一个时代历史学的进步可以有多项标准，史学体裁的丰富、研究角度的变化、对新的问题的考察等等，都是这些标准的组成部分。但在我看来，在这些标准之上且能统摄这些标准的还应当有一个更为本质的大标准，这就是史学观念或史学思想。这是一种深刻的力量，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学都是通过观念和思想达成了自己所属时代的史学目标，并因此而形成了史学史上的起伏、变化和进步。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史学研究的转折，称之为革命性的改变也并不为过。其中最为显著和重要的表现是，我们树立起了独立思考这一科学研究工作最基本的却被长期阉割的学术精神，由此产生了对以往被视为神圣不可动摇的教条的怀疑，并和我们许多值得尊敬的前辈学者一起，努力使中国的历史学走出“奉命史学”、“遵命史学”的樊篱，努力使中国历史学回归到它应有的学术位置。与此相应，这个时代的历史学的进步没有与中国传统文化割裂开来。我们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史学中“求真”和“致用”的优良传统，前者保证了我们对历史学科学性的确认，后者则使我们看到了历史学的现实品格。

以往读李振宏教授的论著和论文，总是能被他的深刻的思想洞察力和敏锐的批判精神所感染，所打动。我上面提到的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在研

究工作中对历史学科学性的确认和对历史学现实品格的实践，在他的身上，在他的文字之中，都有着极为鲜明的体现。最近，李教授寄来大著《当代史学平议》，让我又一次感受到了思想和批判的力量。

其实，这部著作收入的一些论文我之前就已经拜读过，例如《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天高皇帝近”：一个重要的思想史命题》、《文化史研究需要提倡整体性思维》等。而《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这篇长文在发表之前我就已经学习过，而且可能是第一个读者。2008年前后，中国史研究杂志社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走过了近60年，有必要对这段不算短暂且不平凡的时代的史学研究走向做一次细致的梳理，因此准备设立“六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专栏，并约请了几位专家撰稿。这些朋友因工作繁忙没有完成文章，只有李教授赐寄来《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令我非常感动。由于专栏取消，这篇文章也没有在《中国史研究》上刊出。适在此时，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创办了《历史学评论》，承李教授不弃，慷慨允诺将此文交给《历史学评论》。这篇论文是《历史学评论》创刊号上的压轴文章之一，发表后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是迄今为止我读到过的相关问题研究中最有深度的论著。这篇长达10余万字的宏文和李振宏教授的其他论文，体现了他的三个鲜明的学术风格。

首先是他的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历史研究是否要指向现实，历史知识是否要介入现实世界，历史学家是否要具有对现实关怀的精神，这些问题长期存在不同意见。在中国一种有着相当影响的看法是历史学是“无用之用”之学，它应当与现实形成距离，从而保持自身的科学性。我个人未必准确的意见是，这种看法在逻辑上存在着偏差。历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处在变化的过程中，不同时代历史学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由现实所提交的，从而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历史学。由此出发，每个时代的历史学的科学性保证既来自所有时代历史学所共有的“求真”品质，也来自对特定时代现实向历史提交问题的回答。李振宏教授所关注的学术对象，是以其对现实的深刻理解为基础，从而展现了他闪烁着思想光芒的过

人之处。例如，中国的思想史有着怎样的发展路径？这种路径何以表现出与以古代希腊、罗马为原点的西方思想史的区别？李振宏教授指出：“秦汉以后的中国思想史，是没有个性化思想的思想史。因为，在皇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掌控之下，整个民族只能有一种思想，只能用一种方式去思想，只能沿着官方规定的思维路径去思想，只能围绕着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去思想。任凭再聪颖、再智慧的思想家，也必须牺牲自己的思维个性，牺牲自己思想的权利。在思想家的‘思想’之前，就已经为你规定好了思维的路向，思维的内容，就连思维的最后结果也是在思维开始之前就已经给予……所以能够如此，就在于专制皇权的过于强大，在于皇权体制的刻意设计……只要抓住文化专制主义这个本质属性，中国思想史的核心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从思想论思想，由概念到概念，是国内学界惯熟的路径，它能够达到的终极效果是在表层上展现出思想的现象，却不能洞察思想走向的根源。李振宏教授将思想的历程与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分析了思想演变与社会构成的内在联系。这一洞彻思想史脉搏的观察，正是来自他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切体味。如果说解决了“历史”是什么，完成的是对“历史”小“真”的答案；那么解释了“历史”为什么，完成的则是对“历史”大“真”的回答。而对“历史”大“真”的判断，正来自历史学现实品格所喷流出的泉流。

其次是他对历史学思想走向的深切关怀。在《历史学评论》发刊词中，我写了一段话：“在历史学中，也存在着一种记忆，这就是历史学的记忆。这种记忆不仅总结了一个时代历史学的基本精神，更重要的是，它在学术道路的总结中蕴含洋溢着充满反省的批判理念，最终将记忆的经验化为历史学前进的动力。”中国传统历史学“善”、“恶”并存。后一方面，在历史学的目的性而言，它主要不是寻求真知，而是让历史知识成为支持国家统治和正统观念的工具；在历史学的自律性而言，它将“是非据《春秋》”和“扬名教”作为最高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限制了一种学术事业本应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这两种表现在新史学浪潮席卷中国传统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播光大之后依然顽强存在。分析和总结这些表现对于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历史学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个方面，李振宏教授付出

了极大的努力。我想向读者推荐作者《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结语中的一段文字，这些文字是一个真挚的历史学家在沉痛思考后的思想表达，值得我们特别是青年朋友思索：

（最近六十年来中国古代史从业者思想演绎过程）的内在逻辑，实际上就是一个思想从禁锢、盲从，到冲出牢笼的激越冲动，以至于最后达到个体自觉、解放的过程。历史学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思想禁锢，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强化的原因，也根源于几千年历史中权威崇拜、皇权观念和经学思维的思想传统，只不过是人们将对孔圣人和皇帝的崇拜，转化到了对马克思和当今政治领袖身上……当人们真正获得了独立思考的权利的时候，对历史的认识，才可能有所谓真知灼见，产生来自心灵的感应……思想的天性终归是要求独立和自由的，一切对思想世界的规范和掌控，带来的都是实践世界的沉闷和惨痛；保护思想跳动的自由，才是社会建设的至高境界。

思想的自由是人类获得幸福的根基，对于历史问题的自由思考和自由表达是获得真知的前提。衷心希望经过近六十载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几代学人的反思，我们前辈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和经验能够为后来者提供有意义的认识基础，不媚俗，不趋势，不唯上，让中国的历史学成为追求真理的学术家园。

最后是他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深切关怀。李振宏教授是改革开放后我们这一代人中史学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他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两次再版，在学界获得很高评价，是国内这个领域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收入本书的多篇论文讨论了史学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他敏锐地指出：方法论观念淡薄，缺乏方法意识，是中国史学长期沉闷、缺乏重大创新性成果的主要根源之一。我完全赞同这个观点。理论和方法论是一个学科的灵魂，一个学科缺乏理论和方法论，这个学科就不能真正成长。一个学科理论和方法论不能进步，这个学科也将长期停滞。有一句流传很久的话，叫“画鬼（指理论）容易画人（指考证）难”。其实，把“人”画得像“人”

固然不易，而把“鬼”画得“吓人”即有说服力又有指引性更为不易。国内史学界理论和方法论的薄弱原因很多，我以为最为根本的是我们缺乏对于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自觉性和自主性。我们是否能够在具体问题研究基础上，自觉提出有思想的判断和概括？我们是否能够面对已有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自主提出更加合理的观念？这些都是目前国内历史学面临的挑战性问题。我期望李振宏教授这部著作的出版，能够有助于这个挑战性问题的解决。

我和李振宏教授相识已有二十多年，我们都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几年前，上海崇明岛的一个秋夜，我们把酒长谈。帘外细雨霏霏，屋内振宏兄讲述他的曲折人生，讲述他的历史观念，讲述他对中国发展的关切……这一切犹如昨日。振宏兄长我七岁。我常说，如果不是因为十年“文革”的荒诞岁月，振宏兄和其他一些比我年长许多的同学，很可能就是我的老师。他的人生经历、他的思想让我学到了很多历史学知识以外的内容。人生短暂，此生能与振宏兄和其他师兄相识为友，足矣！

彭 卫

2015年3月19日于北京潘家园寓所

目 录

序	彭 卫 / 1
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	1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	113
关于“王权主义学派”问题的对话	163
“天高皇帝近”：一个重要的中国思想史命题 ——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评介	183
论刘知幾史学的批判精神 ——纪念刘知幾诞辰 1350 周年	211
20 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	238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的民族定义研究	288
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方法论研究	336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识论研究	356
大陆学界河洛文化研究的现状及问题	390
历史学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	414
从国家政体的角度判断社会形态属性	425
关于中国史学科的发展问题	434
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中的学派、话语与话域	444

关于创新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453
文化史研究需要提倡整体性思维	461
汉代文化研究需要引起新的重视	468
开辟中国史学史研究新局面的思考	476

体系严谨 多获创见

——评吴泽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	485
朱绍侯先生与中国古代史教材建设	492
汉代学术史研究的新探索	
——读熊铁基先生著《汉代学术史论》	510
一部长于宏观思考的史学史著作	
——评瞿林东著《中国史学散论》	526
建设当代史学评论学科的奠基作	
——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	532
专题学术史研究的新成果	
——读蒋大椿著《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	538
后 记	549

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

一 问题的提出

2008 年和 2009 年，是中国当代史上两个充满回忆和反思的年份。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来说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看到，站在 30 年或 60 年学术发展的高度去反思中国学术的论文论著，一时为盛。但是，综观这些总结，多是对成绩的罗列或问题的反思，并主要是从政治或意识形态对学术的干扰或影响方面，总结学术史上的经验教训，而从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去描述史家治史之思想进程的论述却并不多见。比如总结“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中国学术史，人们都会瞩目于强大的集权政治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在那个时代，中国学者实在是没有多少思想的自由，没有多少可以进行思想或理论选择的权利。所以，对于十七年史学的总结，特别是史学研究中的极“左”化倾向和理论至上的形而上学猖獗，几乎所有的总结性评论，都把问题的根源归之于强权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威压，归结于政治运动对学者人格的摧残和扭曲。这些的确是该时期学术最顽强的特征，但是，强权政治和意识形态，对于正常的学术发展来说，毕竟是外部因素（尽管是学术主体不可抗拒的外部因素），而完整的、全面的学术史总结，不能仅仅考虑外部因素，还需要深入学术内部，特别是深入到学术主体最隐秘的内心世界。考察学术主体内心世界或曰思想世界的

状况及其发展，才可能对学术史的发展历程做出完整且较为深刻的说明。

排除政治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从史学自身出发去总结或反思“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思想理论问题，最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需要考虑：一是中国史学所背负的传统的历史文化因素；二是中国史学家所秉承的经世致用与史学资治观念；三是中国学者思维素质中批判性思维的缺失。这些是十七年史学所以繁荣也所以走向极“左”狂热的根本原因。

首先，所谓传统的历史文化因素，就是几千年所形成的经学传统，对所尊奉的理论观念只能盲目地崇拜和践行，而不能有所怀疑或违逆，这种传统使历史学家将遗传下来的经学态度和经学思维，移植到现实中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态度上去，将马克思主义这一本来具有启迪性和方法论属性的思想理论，变成了只能理解和尊奉的教条，变成了丝毫不能触碰的红线和雷区，并因此窒息了它的生命力，使之失去其所可能具有的强大的方法论效应。其次，强大的经世致用和史以资世的史学思想传统，使得历史学家将历史学的功能，直接理解成为现实的政治和政策服务，自觉地肩负起类似《资治通鉴》的御用使命，使史学沦为解读政治和政策的工具。特别是当历史学家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激发起强大的政治热情的时候，这种资治观念就被发挥到极致，提出最政治化和现实化的命题，并形成趋之若鹜的局面。所谓“五朵金花”正是这样的产物。最后，批判性思维的缺失，则是中国历史学家的先天性痼疾。中国古代没有这个思维传统，即使有几个具有批判素质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如王充、刘知幾、李贽等，也被时人或后世所诟病，远没有形成一种思维的传统。批判性思维的缺失，使得历史学家在接受一种理论或思想的时候，失去独立思考的基本品格，而被盲目性和狂热性所左右。

在实际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这三种思想因素的结合，促成了“左倾”学术思潮如洪水般泛滥。三种因素的结合是这样实现的：资治传统调动了历史学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现实政治中的中心课题则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经学思维使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注经性阐述，把经学家发明微言大义的

技能发挥到极致，对个别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极端性泛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大讲阶级斗争的现实中，被政治所中意的马克思的个别词句，则只能是其阶级斗争理论；批判性思维的缺失，则使得历史学家对于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之口的任何言语甚至只言片语都奉为圣明，丧失其分析和批判的意识和能力，盲目遵循，顺旨发挥，竭尽所能去实现放大效应。十七年史学中，对古代史研究破坏性最大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是在这样的知识思想背景下，被发挥、演绎而放大到极致的。

本来，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阶级斗争理论只具有次生形态的意义，马克思明明讲过，“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①这一思想表达，一方面说明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只是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远不是唯物史观最核心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它也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那里，阶级理论的运用只能在历史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去进行，任何时期的阶级与阶级斗争，都是特定的生产发展阶段的产物，离开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经济状况的具体考察，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性质、内容、形式与特征，等等，都不能得到历史的说明。如果我们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这样的理解，它倒还是可以作为一个观察历史问题的思想方法。然而，在十七年史学中，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这一基本属性，完全被扭曲了，被夸大到了唯物史观理论的核心观点的地步，并被用来无条件地、万能地解释古代历史中的一切问题，成了历史研究唯一的方法论原则。这里，一方面有毛泽东对阶级斗争问题的极端性表述为导向，^②另一方面，也有历史学家对这一理论的积极主动的推波助澜。无疑，历史学家本身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古代史研究中，阶级斗争方法的极端运用及其泛滥，都是通过历史学家的聪明才智去实现的，他们自身表现了主动性与创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47页。

② 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91页。

性，绝不单单是一个完全被动执行或违心接受的问题。历史学家自身对极“左”思潮的推波助澜作用不可低估，对历史学家自身的分析或解剖，揭示一个时期历史学家思想世界的真实图景，应该是我们认识该时期史学状况的新的视角。

从学术史的内在线索出发，中国古代史研究六十年的发展史，可以粗略分为三个阶段：“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化大革命”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十年时间，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二十年。至于“文化大革命”十年，严格地说是没有学术可言的；如果硬要谈什么学术，也是一个扭曲的阶段，难以从学术自身去总结，可以视为学术的断裂期略而不论。本文就依循新中国史学发展三阶段的历史线索，从解剖历史学家自身思想状况的角度，揭示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思想演绎的历史过程。^①

二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国古代史 研究的思想世界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基本形态是“阶级斗争史学”，最顽强的特征就是阶级斗争思维。在那个年代里，研究课题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问题，研究方法是阶级分析方法，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一切研究都被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离现实较近的中国近现代

① 作为一篇论文，该选题的确是过于宏大，对于所要论及的问题之繁复几乎难以掌控。思想的进程，不是一个人的思想进程，而是一个具有千差万别的学术个性和不同思想向度的学者群体的思想进程，如何把握颇费思索。笔者采取的方法是，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思想高度统一、缺乏个性色彩的时代，基本上采取一般性论述，所举案例多以当时最著名的学术大家和流行的通史著作为例；而之后的两个时代，相对于前一时期是一个发展和变化的时代，而任何一个发展变化的时代，也都存在变与不变两种要素，甚至对于一个只有十年、二十年的短时段来说，不变的要素很可能还是最普遍的可以看作群体思想的底色的色素。但是，对于本论题要写思想的进程这个主旨来说，写作一个变化的时代，则只能抓住那些变化的因素，那些代表着思想发展方向的因素。所以，在第二或第三阶段的描述中，笔者要着重揭示的是那些反映思想变化趋向的东西，而不是作为最普遍的底色的也可以目为惰性的思想成分。于是，笔者关于第二或第三时段的描述，所选择的研究个案就难以反映该时代的大多数人的思想，而只是评述那些走在学术思想前头的人的思想。

史研究是如此，古代史研究中也是如此，人们是唯知有阶级，无论其他。于是，从事古代史研究的历史学家的思想世界里，无论研究什么，也都只是跳跃着“阶级”二字。

（一）一般政治经济史研究中的阶级斗争思维

历史学家的阶级斗争思维，既来自于现实政治生活中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的启迪，也是历史学家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严重片面化的结果。由阶级斗争思维产生的古代史研究成果，大都远离了历史本身。譬如对经济史上一些重要历史现象的解读，就完全抛开了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对唐代重要赋税制度“两税法”的评论就是如此。《中国通史》写道：

初行两税法，百姓也有些好处，安、史之乱后，朝廷急需钱物，随意增设税收官，多立名目，旧税加新税，无有限制……两税法虽然对民众的负担丝毫不曾减轻，而且还加重些，但比起乱收税来，总算是有个统一的税制。可是，腐朽已极的唐朝廷，只知道要钱愈多愈好，从七八一年藩镇田悦等叛变时起，两税法又变成乱收税，民众受害与改制以前一样严重。

颁行两税法时所说的九条规则，在唐德宗在位时，已经是每一条都起残害民众的作用。^①

这段文字中对两税法的评价，完全是从农民税负之轻重去分析，即使对它最初施行时的些微肯定，也是因为它对“百姓也有些好处”；而不是从赋税史的内在逻辑、发展轨迹去判断其合理性。这样的评价角度完全离开了历史本身，离开了经济规律的必然性问题。先验的阶级立场代替了一切，历史评价变成了一个政治或道德评价。

同样，对赋税史上另一个重要变革，明代“一条鞭法”的评价也是如此。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对一条鞭法的总体评价是：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3册，人民出版社，1965，第277～278页。

(一) 一条鞭法最主要的历史意义,是它调节了差役制度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矛盾,因而多少起到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维护生产秩序的作用。

(二) 一条鞭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明中叶社会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有着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三) 一条鞭法促进了封建社会内部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封建国家结构的强化。一条鞭法的实行,虽然意味着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直接的人身强制的某种程度的松动,但地主阶级为了实现其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不得不借助于强大的暴力机器,必须不断地完备和强化自己的国家机器。同时役制改革的本身也促进了封建政治结构的强化……

(四) 从整体上看,一条鞭法的实行,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一条鞭法实行差役货币化以后,就为封建国家打开了一条任所欲为地“加派”银两的道路,税款不断增加,因而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①

以上评价的关键词,就是“封建国家”、“地主土地所有制”、“阶级矛盾”、“暴力机器”、“剥削”、“人民的灾难”等等。即便是它具有人们可以认同的对于资本主义萌芽所起到的“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也必须强调指出它“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谴责地主阶级、剥削阶级,这个根本的阶级立场时刻都要旗帜鲜明。至于一条鞭法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出现,它在赋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它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历史进步性,这个历史评价的基本立场则被完全抛弃了。

两税法 and 一条鞭法,都是中国古代赋税史上的重大变革,体现着经济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而对它们的评价,都被用来当作表达阶级立场的工

① 余用心:《关于明代一条鞭法的考察》,《西北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该文的“编者按”指出,该文写于1964年,“文化大革命”后经他人删改后发表。所以,此处用作20世纪60年代的代表性观点。

具。在这样的历史评价中，思维变得极其简单，凡是劳动者就是好的，是进步的；凡是地主阶级或统治阶级就是坏的，是反动的。思维的形而上学猖獗，到了几乎不需要任何理性分析的地步。历史学家的思维已经被现实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完全扭曲了。

既然是要站在抽象的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评价历史，那么，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所谓封建政府，就必须给予完全的谴责和否定。于是，在这个年代中国历史学家笔下，封建地主阶级就完全成了一个反动的阶级，它不可能起到任何积极的历史作用，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历史主动性。《中国通史》对隋初的政治就有这样的描述：

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总是有两种作法。一种是孔、孟的传统政治思想，即剥削较有节制的所谓行“仁政”。这在封建时代，应该说是进步倾向，因为农民迫切希望统治阶级不要夺去过多的生产品。另一种是腐朽势力的作法，那就是不顾农民死活，横征暴敛，贪得无厌，用来填无底的欲壑。进步倾向和腐朽势力在统治阶级内部常常发生斗争，如果进步倾向得势，阶级矛盾就比较缓和，出现“治平”的景象；反之，腐朽势力得势，制造各种祸乱，毒害民众，最后爆发农民起义，打击以至推翻腐朽统治。从表面看，一“治”一乱若循环，似乎是统治阶级自身的事情，实际上“治”是农民起义的产物，没有起义的威力，统治阶级是不会求“治”的。^①

根据这样的观点，一切统治阶级都是反动的，所以是不可能求治的。我们对历史上的国家职能只能做如此反历史的理解。当然，是时的人们也知道毛泽东关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夺取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②的论断，从理性上承认地主阶级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3册，第424～425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92页。